



荆史新探

# 砖窥荆州

□ 刘青

洪武年间的舞水河畔,无数青砖正在等待装运上船,它们于窑窿披烧制,其正面刻有辰州和沅州提调、司吏的名讳,反面则镌有总甲、小甲、造砖人户、窑匠的姓名,如此严密的质量监督体系让每一块砖石无可挑剔,几百年后它们依旧“扣之有声,断之无孔”,这些青砖是朱元璋反腐肃贪制度的末端落实,也是中国古老物勒工名制度的完美呈现。与此同时,帝国的航道交错,这些来自湘西的青砖自舞水辗转数百里,经沅江、常德,过津市、公安,最终抵达目的地荆州,它们被工匠砌入荆州城墙,见证着以后四百余年的岁月风霜。

同一时间,湖北本省州府承制的青砖也运至荆州城,在杨璟的调度下,来自湖南、湖北两省八府近五十县的青砖共同筑成了明洪武年间的荆州城墙。然而,这并不是这座城池的始初,因为在更早的以前,这座城就以夯土的形式屹立于长江北岸,而自五代起砖石成为这座城池不可分割的部分,护佑一方水土的平安。

在荆州城墙11号马面的考古发掘现场,绳纹砖、侍女纹饰砖重见天日,这些原属权贵墓室的砖块与文献所载的南平国往事互为印证。《新五代史·南平世家第九》载:“季兴见梁日以衰弱,乃谋阻兵自固,治城隍,设楼橹。”《旧五代史·世宗列传二》载:“荆南旧无外垒,季兴始城之,遂厚敛于民,招聚亡命,自后僭臣于吴、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乱世之中,出身卑下的高季兴以丛林法则发迹,在拥有一定势力范围之后自然更不按常理出牌,他自“郭外五十里家墓多发掘取砖,以甃城”,自此江陵城的夯土城墙被砖石取而代之,荆州城墙步入了砖墙时代。与此同时,高氏采用了极其灵活的外交策略和“事大”政策以求独立。固若金汤的荆州城墙与圆滑变通的纵横之术互为照应,为南平国赢得了三十九年的休养生息,而那些本做墓砖的城砖则见证了彼时或战或和的南平故事。

二百多年后,当历史的年轮辗转至南宋,前右丞相赵雄自政治中心临安来到江陵任知府,那时的他应该很失意,他曾力主抗金,也曾被论恢复,还曾在金人的地盘与金主据理力争,他曾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次年也就是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五月江陵连日大雨,民舍3000余家被大水冲走,惨绝人寰。“江陵无险可恃,雄请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扰。”今天,仍可以在《宋史·赵雄传》找到这样的记载。治水通常是修筑堤坝,但是赵雄却重筑江陵城墙。城墙体系(通常为城墙、护城河、瓮城)形成立体防线,提高了敌人的进攻成本,而城郭与护城河连通自然水系又兼顾了防御与运输。当赵雄挥汗如雨监造

城墙时,他是不是也在用另一种“徐徐图之”的方式准备他心中的“北伐”,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我们依旧可以从24号藏兵洞三面墙体的宋砖窥得当年的峥嵘岁月。白驹过隙,荆州城墙残存的宋砖已成为赵雄的丰碑。

当蒙元的铁骑踏破临安,南方诸城的城墙被勒令拆毁,考古材料证实,荆州城虽没有化为乌有,但荆州城墙仍然遭到了大规模破坏,而武昌正逐渐取代荆州成为湖北新的政治中心。然而,历史自有它的幽默与吊诡之处。就在南方的城池被平毁之际,蒙古居民却在接受汉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学习汉族筑城而居的生活方式。内蒙古地区迎来筑城新高潮,于是那里留下了众多农耕文明的城池建造技术与游牧民族的特色相结合的城垣。

武力强盛的元朝仅维持了九十余年,元大都被攻破后,元顺帝北逃大漠,朱元璋在南京坐稳了他的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因为天下平定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高筑墙”作为国策得以延续,各地城池复起,当代现存的古城墙几乎都与明代有关。城墙不仅仅是防御工事,更是明帝国权威在地方的象征,它的再次修筑代表着权力的转移,代表着社会秩序的重构,是农耕文明的反攻,也是儒家传统的又一次确立。彼时,荆州仅仅是一个府城,但是从各地输入的青砖铭上依旧可以看出数百里甚至上千里的之外的地方政府承制的城墙被大规模征调,足以说明荆州依旧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明一代,荆州的城墙一直在进行有序修缮。清顺治十四年付梓的《江陵志余》曾载:“万历初,邑人张太岳在朝,俾增甃之。”而笔者曾在荆州城墙上观得数块镌有“荆州府委官百户张恩/督管荆州窑户乔应时造/万历十年六月廿一……”的城砖,而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在京去世。据考证,现存万历原墙在荆州“城垣中现存最多(超过一半),墙体基本完整,纪年明确,勒名清晰”。

有明一代,筑城行动贯穿始终。但是,雄伟的山海关终究没能挡住游牧民族的又一次南下。来自白山黑水的满蒙军士作为八旗驻军来到一座座城池,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荆州自然也成了他们的选择。康熙二十二年,荆州将军府设立,一万余名满蒙将士及家属自关外辗转至荆州城,他们并不是城墙的拆毁者,相反他们在城墙内繁衍生息,用自己的方式缔造荆州城。只是一道界墙横亘其间,城东是满蒙八旗的聚居地,是为满城;城西系汉族原住民所在地,是为汉城。政治上的确做到了满汉分治、互不通婚。纵然以墙为界,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渐渐向对方

楚史杂谈

# 为什么围宋之战使楚庄王霸业达到顶峰

□ 余大中



楚庄王在公元前606年观兵周疆、问鼎轻重,又于公元前597年在郟之战中大获全胜,称霸中原,此后于公元前595年取得围宋之战的胜利。此战因楚庄王率军包围宋都长达九个月而闻名天下。战役期间,晋国虽宣称出兵救援,实则因惧怕楚军而按兵不动,这一行为令其失信于诸侯,霸权进一步衰落。最终,宋军被迫投降,楚、宋两国会盟收场,楚庄王的霸主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霸业达到顶峰。

申舟之死是围宋之战的导火索。申舟是楚文王的后代,半姓,文氏,名无畏,字子舟,因受封于申地,以邑为氏,别为申氏,故又被称为文之无畏、毋畏、文无畏。早在公元前617年楚穆王时期的孟诸之役中,因宋昭公违反狩猎规矩,申舟便以鞭打其车仆的方式惩罚宋国君主,此举严重侮辱了宋国。到了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派遣申舟出使齐国,明确要求其“无假道于宋”(不向宋国借道)。申舟深知此行凶险,曾请求与公子冯交换任务以避祸,却未获楚庄王允许。临行前,他将儿子申犀托付给楚庄王,暗示此行凶多吉少。后来,申舟途经宋国时未履行借道的外交礼仪,宋国右师华元认为此举是将宋国视为楚国领土,是亡国之辱,力主斩杀申舟以维护国家尊严。宋文公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斩杀申舟。申舟被杀后,楚庄王震怒,于公元前595年九月率军围攻宋都城商丘。

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宋文公一方面带领军民坚守都城,另一方面派遣乐婴前往晋国,向晋景公求救。晋景公询问众卿意见,大夫伯宗反对出兵,认为此时楚军国势鼎盛,仿佛有上天眷顾,难以与之争锋。晋景公采纳了他的建议,派遣解扬告知宋国人晋国援军将至,鼓励宋国人坚持抗战。事实上,晋国尚未从郟之战的阴影中走出,不敢再轻易向楚军宣战;但又怕宋国倒向楚国,因而派解扬出使宋国,谎称晋国援军很快就到,以此鼓励宋国继续坚守。解扬在途中被楚国人俘虏,最终仍设法将消息传递给了宋国。此后,宋国军民死守都城,拒不投降。

与此同时,楚军长期围困宋国,军中粮食即将耗尽,而宋国仍坚守不降,楚庄王便准备撤军。申舟之子申犀请求为父复仇,坚持继续攻宋。楚国大夫申叔时献上“筑室反耕”的策略,即楚军在宋国境内建造房屋,同时将部分士兵遣回田间耕作,以此向宋国表明长期围困的决心。宋国人见此情景,心生畏惧,于是派华元在夜里潜入楚营,登上楚军主帅子反的床将其叫醒,提出若楚军退兵三十里,宋国便一切听命于楚。子反与华元定下盟誓,并将此事报告给楚庄王。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当时“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折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敌,遂罢兵去”。《左传·宣公十五年》对此事记叙更为详细,《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则与之略同。楚庄王见宋国已臣服,便下令退兵三十里,宋国随即与楚国讲和,华元按许诺前往楚国做人质,楚军则解除包围撤军而回。

关于围宋之战的持续时间,《春秋》《左传》等记载为从公元前595年秋九月至第二年夏五月,前后共九个月;《史记》则称围宋五个月。当本文多处持九个月之说。总的来讲,这是一场跨年度的长时间攻坚战。此战令中原诸侯谈之色变、震惊不已,他们对楚国既畏惧、又敬佩、又不满。所畏惧的是楚国国力之强远超诸侯意料——楚国竟能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为千里之外的三军提供补给,其国家综合实力由此可见一斑。即便诸侯各国拥有坚固的城池,楚国也全然不放在眼里。《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鲁国大臣孟献子(公孙归父)建议鲁宣公遣使前往宋国,向楚庄王“聘而献礼”,以“谋其不免也”,鲁宣公表示赞同,随即派孟献子前往宋国拜见楚庄王,此举进一步加强了楚、鲁之间的关系。

三袁文化随笔

# 袁照:公安袁氏家风浸润出的儒吏

□ 余波

暮色漫漶的傍晚,同住一个小区的文史收藏家葛老师给我发来一张信札照片。纸页泛着经年的米黄,墨迹却依旧清晰。这是“公安三袁”之中袁宏道的六世孙——袁照,在内容任上写给同僚秦焕(字笠翁)的一封信函。字里行间,不仅藏着袁氏后人的为官轨迹,更承载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家风传承。让我们清晰看见:从公安派“独抒性灵、求真务实”的文脉基因,到袁照以“儒吏”之身践行的民生实务。袁氏家风,如公安的雨、包容的风,润物无声,却掷地铿锵。

袁照,字万皆,湖北公安人,附贡生出身,乃袁宏道六世孙。他出生时,先祖“公安三袁”的声名已如暮云垂野,笼罩荆楚文坛。然而他并未借这重云翳走科举捷径,而是以附贡生身份,一步步踏实迈入仕途。同治七年(1868年),袁照初任江宁(今南京)南捕通判,主管一县治安司法,负责城内的陆上缉捕事务,便展现出鲜明的务实作风:案卷逐页细审,案情必实地核查,即便偏远村落的纠纷,也亲自前往厘清。同僚笑他“迂”,他却正色回应:“先祖为文求‘真’,我为官更当求‘实’。”

光绪四年(1878年)袁照调任句容(现江苏省句容市),权知句容县事(即担任句容知县)。自此,他开始了在句容长达十年的任期,并将袁氏家风拆作砖石瓦砾,细细砌进这座小城的肌理。

在句容任上,袁照可谓政绩卓著。他见句容城墙夯土不实,他亲勘城郭,指着薄弱处对工匠说:“这是百

姓屏障,半分马虎不得。”亲自督工,以青砖重砌东西堞楼。据《光绪句容县志》载,他于“光绪五年捐廉重建东门”。这份亲力亲为的较真,承接的正是袁氏“做事不避繁琐、只求扎实”的民风。

当时,天花肆虐,民间仍信“求神避瘟”,他力排众议引入牛痘接种法,设立官局免费为孩童接种,还亲自向百姓讲解医理。这股“敢破俗、重民生”的决断,恰是袁氏“以民为本、不循旧弊”家风的体现——袁宗道“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理念,到了他这里,化作“为官当解民之困”的实践。

他还捐出养廉银兴办育婴堂,收养弃婴;筹集四千缗钱续建华阳书院,亲督工匠修复文庙。《句容县志》称其“人皆称为儒吏”。“儒吏”二字,正是袁氏“文以载道、行以济世”家风的当代延续。

光绪四年句容大旱,田地龟裂,河塘见底。袁照没有躲在衙中发告示,而是带着属吏来到宝华山麓,与乡民一同跪在青石板上焚香祈雨。在致秦焕的手札中,他写道:“三日灵雨之应,实由阁下同诸公至诚之念所感。”这不是迷信鬼神,而是深知:百姓所求的,是“有人同担艰困”的那份安心。这一跪,跪出的是袁氏“不尚虚浮、唯重真心”的家风。雨落之后,他创建宝华龙神祠,复建茅山下泊官华阳书院,又筹款续修文庙,亲自主持工程。

作为袁宏道的后代,袁照深知家风的传承不仅在行,亦在文脉。他血液中流淌着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基因,诗作《过长安》中“水阔云低雁字横,秋

风先到公安城”之句,既眷恋故乡,也呼应着先祖“以诗明心”的传统。

在内容任上,他遍访吴越藏书家,校勘《袁中郎全集》,逐字核对补缺,守护家族文脉;政务之余手辑《小学》一书,以《论语·弟子章》为纲,引经据典加以阐释,并注“童蒙之本”,非识字学,当养性灵之本。这份“以文化人”的追求,正与袁宏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一脉相承,让袁氏家风从纸页走入现实,成为滋养句容学子的精神源泉。

在他致秦焕的信末,这样写道:“弟赋性迂拙,阙误甚多,何能仰召天和,更望明赐箴规,为荷。”没有官员的倨傲,唯有文人的温润与真诚。这是公安派“不倨傲、尚真心”品格的延续。袁宏道交游“以真心待之,不饰虚言”,袁照则将这份真诚带进了官场。其字里行间尽显一个“真”字,是先祖的文髓,也是他为官为人的底色。

如今的句容,华阳书院飞檐依旧在细雨中低语。袁照这位袁宏道的六世孙,从未刻意标榜家风,却早已把家风刻进骨血:修堞楼的扎实,设牛痘局的果决,办书院的赤诚、校文苑的执着……让袁氏“求真务实、以文济世、独抒性灵”的家风,在句容的土地上生根开花。

他留下的不仅是政绩与典籍,更是一种跨越数百年的精神传承。最好的家风,从来不是高悬于堂的训词,而是像他这样,将先祖精神熔进生命、落于行动,让每一件实事、每一通信札、每一卷方志,都成为家风最鲜活、最铿锵的解读。

二〇二五年第四十期

# 文化荆州

总第一百七十二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翰墨荆楚

山静松声远  
秋清泉气香

山静松声远 秋清泉气香  
金伯兴书